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重点出版物

“二战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

孟钟捷 主编



从改造到自省

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

沈辰成 著

FROM PUNISHMENT TO IN-
TROSPECTION:

A STUDY OF U.S. NON-FRATERNIZA-
TION POLICY TOWARD GERMANY

CHENCHENG SHEN

书社

从改造到自省

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

沈辰成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改造到自省——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孟钟捷
主编,沈辰成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15.6

(“二战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

ISBN 978-7-5461-5060-4

I. ①从… II. ①孟… ②沈…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德国 IV. ①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8903 号

CONG GAIZAO DAO ZIXING—ZHANHOU MEIGUO DUI DE FAN QINSHAN ZHENGCE TANWEI

从改造到自省——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 孟钟捷 主编 沈辰成 著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任耕耘

执行策划 马磊 王舒彦

责任编辑 王舒彦

责任校对 徐佩兰

装帧设计 未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200 千

印张 17

书号 ISBN 978-7-5461-5060-4

定价 45.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一

王斯德

2015年,人类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神圣时刻,全球各地举行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人们在这一重大的纪念时刻,不由得对历史进行深沉思索,对未来作深刻思考。

从永定河畔的卢沟桥,到来凤山下的国殇园,从欧洲大陆的格但斯克,到太平洋之滨的东京湾,遍布世界的警钟正逐一敲响: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隔21年,战争的伤口还未愈合,为什么人类又急速重蹈覆辙,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和浩劫?人们从中应记取什么历史教训?人类怎样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这是世人深切关注的时代议题。对此,人们可以多视角、多领域、多层次地进行研究探讨。由孟钟捷教授主编、黄山书社出版的“二战战败国的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则从战败国改造与反省的比较角度叙述和剖析了西方战胜国对德、日战败国处置的方针和措施,战败国德国、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实际作为,以及造成两国不同差别的原因和结果。问题意识鲜明,针对性和现实感强,富有启迪警示意义。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更不是为了播种新仇的种子,相反,是为了捍卫和平,彻底根除产生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仇的土壤和环境。想当初,希特勒纳粹党就是在一战后德国不甘失败、不肯认罪的历史背景下,借助煽动和利用民族复仇思潮而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这一血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铭记。本丛书是以铭记历史、捍卫和平为主旨建构全书的框架体系,展开精细深入的阐释解析。

总的来说,德国进行了较深的反省,认罪服罪的态度较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承认希特勒德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德国对其后果愿“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当年受害国和受害人道歉、赔偿,请求宽恕。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碑前双膝下跪,真诚之心令世人感动,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青年一代进行了理性的正面教育。德国的知罪认罪、幡然悔悟、决意归正等一系列的言行赢得了欧洲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敬,使整个国家终于“战胜过去”,摆脱了70年前的历史包袱,告别了野蛮、邪恶、黑暗的旧时代德国,开创了民族复兴的新未来。值得指出的是,丛书对德国的改造和反省并不简单化地加以记述,而是强调德国对二战的反省经历了逐步深化和曲折起伏的过程,德国历史观的转变,也经历了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这使读者更真实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当人们的目光从欧洲的德国转向亚洲的日本,看到的则是另一番的景象。丛书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对日本社会在战争记忆中形成的复杂局面作了深入的论析,不仅观察了战败国是否真正反躬自省,而且审视了战胜国是否有效地推动战败国走向新生。战

后单独拥有占领权的战胜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霸权意图,违反国际公约精神,对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和实行有效的根除措施,致使右翼势力始终得以潜伏、滋长。他们不服输、不认罪、不悔罪,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伪造历史,掩盖侵略战争的本质,在反对“自虐型历史观”的幌子下,与周边受害国家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历史认识之争”,拒绝向被侵略受害国家认罪道歉。可笑的是,甚至连战败的事实也不肯公然承认,竟将战败称为“停战”。近期来,在右翼势力的鼓动支持下,日本不断按扭曲的历史价值观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举行规模日益扩大的参拜靖国神社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变本加厉地蓄谋修改和平宪法,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壮大日本自卫队,妄图实现重新武装,成为军事大国。所有这些倒行逆施的言行怎能让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放心、安心?

世界持久和平不会自然到来,和平需要努力争取,日本能否走和平的道路,要靠国际社会的合力推动(包括德国自我反省正面榜样的影响),要靠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督促鞭策,更要靠日本全体人民清醒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自觉反省,自我改造,走自赎自救的光明之路。路在何方,相信认真阅读本丛书的读者都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丛书注重科学性、学术性与公众性、通俗性相结合,以面向大众、普及历史教育、培育公众历史意识为宗旨,表达风格上力求通俗流畅、生动形象,可读性强,富有感染力,力避引证繁杂和书写外国史时常见的洋腔洋调,在融入国际二战文化中保持中国学者的风格特色。

丛书十分注意科学性,遵守学术规范,求真求实,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不尚空谈,不随意武断定论,使读者的认识获得自由深化的天地。

近年来,丛书的主编孟钟捷教授积极倡导和践行公众史学的研究和著述,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写作团队,并联合相关的出版团队,共同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发展繁荣辛勤耕耘。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可喜的成果,值得庆贺,衷心祝愿各位继续执着前行,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读罢丛书有感,略述数语,权充序。

【王斯德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历史教学问题》主编。】

序二

孟钟捷

每到重大周年纪念时刻,历史工作者总会自然而然地去思考“历史记忆”的意义究竟何在等一类的宏大问题。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种思考当然得继续下去。

历史记忆一般可分为两类:个体的和集体的。个体历史记忆虽因主体经验的差异性而色彩斑斓,但由于身体机理的缘故,终究会随着肉身死亡而消退。与此相反,集体历史记忆虽因统一的旨趣而略显单调,但它可以借助各类媒介,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延续性,并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有社会文化的反映。

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这场世界大战而言,硕果仅存的盟军老兵、不断被噩梦惊醒的慰安妇、永生背负罪责的行凶者等,当然是亟须通过口述方式来加以抢救的二战见证。但相比之下,关于二战的集体记忆及其形成机制,因其涉及面之广、内涵之深,才是当代历史学界极为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在对德国、日本两个战争元凶国家的对比研究中,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是:1945年后,它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负担”的?它们的立场何以形成?又怎样发

生变化?

一般认为,德国的认罪态度要好于日本。这不仅反映在德国政治家们不厌其烦地向当年受害对象道歉与赔偿的行动中,而且还实实在在地体现于历史教科书中长达数十页的“犹太大屠杀”描述里。不过,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告诉我们,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被占领时期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认可态度,很快随着建国初期追求“正常化”的心理而下降,大量前纳粹分子由于“大赦”而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尽管如此,基督教回忆文化的自责特征、第一代领导人的谨慎立场、保守派历史学家们的巧妙诠释(即把纳粹历史与德国文化区分开来)、记者们探求真相的不懈努力和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冷静态度,特别是来自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压力,才一步步地促使“奥斯维辛”进入到德国的国家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变。自此之后,与纳粹主义的清晰切割成为社会共识,“历史负担”反倒扮演了联邦德国在历史政治中的前进动力。

与此相反,日本的罪责观远远落后于德国,如基特尔所言,“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本,东京审判的认可度不断下降,把战犯视作“烈士”的观点反而越来越受到拥护。对此,基特尔认为,“耻感文化”的内因解释并不足以让人理解日本对待“历史负担”的基本立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战后所面临的“完全不同的框架条件”:首先,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免除天皇的战争罪责,匆忙结束“政治整肃”以应对“冷战”格局;其次,被侵略国十分轻易地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战后改造的强力监督,甚至出现了东京审判时印度法官以日本侵略造成殖民帝国后退为

由对所有被告做无罪释放的提议；再次，与强大的美国犹太人势力相比，亚洲被侵略国在美国的侨民无法形成有效的院外游说力量，来对美国的日本政策施加影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二战记忆文化中的“核爆炸画面”让日本形成了建立在广岛经验之上的“耿耿于怀的受害者意识”，以至于在日本公众意识中，并没有彻底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罪行划清界限。

值得关注的还有两国右翼翻案的效果比较。在德国，右翼提出了“德累斯顿遭受盟军轰炸而遇难的平民”“战后初期东部疆界变动中被迫迁徙的德意志人”等悲情话题。但无论怎样，这些讨论都遭到了“犹太大屠杀唯一性”的阻击，奥斯维辛的种族灭绝特性让其他战争罪行都黯然失色。在日本，广岛和长崎被界定为“遭受核爆炸种族灭绝”的纪念地。这种说法不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也得以成为全球二战记忆文化的两张经典图片之一（另一张就是“犹太大屠杀”）。日本右翼以此来固化“受害者”情结，并借此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写。在这一点上，基特尔以德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结论：日本右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整体上类似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右翼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即以充满闪烁的言论来否认“侵略”与“战败”的事实，进而用蛊惑人心的认同需求来刺激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当然，如同战犯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样，当下德国、日本两国的高层罪责观与老百姓的历史认识之间也存在着既相互支持，又相互排斥的关系。政客们看待“历史负担”的模式，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暗潮涌动的“民意”鼓励。这在德国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初新任总理科尔大谈“晚生的幸福”，而在日本便出现了首相

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但是,两国都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冲突,青年人并没有放弃对战争一代的“历史清算”。在德国,当批判近代德意志人抱有所谓“灭绝性种族主义”观念的著作遭到老一代知识分子抵制时,青年人却把该书作者奉为偶像;在日本,因历史教科书事件而长期上诉的家永三郎先生也不乏青年支持者。这是我们判断当下德国、日本政治文化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①

为了进一步从历史视角来剖析德国、日本两国战后反省道路的异同性,本套丛书的第一批四本专著首先从个案角度探讨下列四个具体问题:(1)外部力量(美国)在改造德国进程中的政策为何遭遇困境?(2)作为大国合作机制的重要产物,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是如何在矛盾动荡中塑造一个新德国的?(3)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战争赔偿问题与日本对外经济援助)如何反映日本对于战争罪责问题的回避?(4)日本社会在战争记忆中形成了怎样的复杂局面?

作者中既有在学界已获得崇高声望的历史学家,又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史坛新人。感谢他们从各自擅长的角度,对学界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别出心裁的回应。这些研究无疑是对二战记忆研究的深化和推进。笔者希望以此为基础,在接下去的一系列专著、译著中,能够一步步地夯实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历史认知。

笔者还要感谢德高望重的王斯德教授。感谢他一直支持笔者

^① 参见曼弗雷德·基特尔:《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吕澍、王维江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述部分内容已由笔者发表在《文汇报》2015年3月31日“文汇学人”栏目中。

在二战记忆比较研究方面的工作,并慷慨应允为本套丛书作序。

笔者特别感谢黄山书社诸位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使得本书能够赶上二战胜利 70 周年的重大纪念时刻顺利付梓。

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是笔者的学生王舒彦。从 2006 年开始,笔者作为他的本科基地班导师,看着他一步步从青涩学生成长为今天兼具历史学识与市场判断力的“书场弄潮儿”。笔者十分愿意、也更为欣慰地迎接首套师生合作的智慧果实。当然,其中若存在任何不妥之处,当有笔者来承担。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笔者邮箱:dehnmeng@sohu.com)。

目 录

导论/1

第一章 反亲善政策的起源/17

第一节 “希特勒即德国”

——艾米尔·路德维希和反亲善构想的提出/18

第二节 德国的三张脸谱

——战时美国社会对德国问题的争论/29

第三节 反亲善政策的酝酿出台/47

小结/61

第二章 盟军的反亲善困局/65

第一节 反亲善政策的颁布和强化/67

第二节 反亲善宣传和教育/80

第三节 盟军士兵眼中的德国形象/100

第四节 “65 美元问题”

——违令亲善活动的泛滥成灾/115

第五节 反亲善政策的放宽与取消/147

小结/158

第三章 反亲善政策和德国人/161

第一节 德国人对反亲善政策的反应/162

第二节 从指控到自省——

德国社会对“集体罪责”的回应/175

2 从改造到自省——战后美国对德反亲善政策探微

第三节 反亲善政策的后遗症

——战后德国社会的亲善问题/194

小结/212

结语/215

附录/227

参考文献/250

导 论^{*}

一、问题缘起

二战回忆录《兄弟连》记载了一个小故事。1945 年春,德军溃败,美军长驱直入德国境内。某日,美军 101 空降师的士官杰克·E·福利(Jack E. Foley, 1922 - 2009)正在挑选民宅过夜,巧遇两个美国步兵和两个德国姑娘相谈甚欢。福利顿时暴跳如雷,他斥责二人的行为恶劣透顶、令人发指、严重违规,必须绝对禁止,最后直接勒令他们滚蛋。挨骂的两个步兵百口莫辩,只得悻悻而去。^①

* 封面图片为 1945 年 6 月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图片来源为 Carl Weinrother, *Berlin, Brandenburger Tor und Pariser Platz*,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 Bildbestand (B 145 Bild), B 145 Bild - P054320. 转引自 [https://de.wikipedia.org/wiki/Brandenburger_Tor#/media/File:Bundesarchiv_B_145_Bild - P054320, _Berlin, _Brandenburger_Tor_und_Pariser_Platz.jpg](https://de.wikipedia.org/wiki/Brandenburger_Tor#/media/File:Bundesarchiv_B_145_Bild_-_P054320,_Berlin,_Brandenburger_Tor_und_Pariser_Platz.jpg).

① 斯蒂芬·E·安布罗斯:《兄弟连》,王喜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 294 页。Friedrich Baerwald, "Non-Frat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Breakdown of an 'Operational Concept'", *Th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 No. 1 (Mar., 1946), p. 17; 另外参见 Petra Goedde, *GIs and Germans: Culture, Gender, and Foreign Relations, 1945 - 194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3.

这件战时逸事,真实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在德国实施反亲善政策的历史事实。1944年9月12日,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SHAEF)命令所属各部,除非经过特别授权,否则禁止盟军以任何方式接触德国军人、官员和民众。美国人把这项举措命名为“反亲善政策”(Non-Fraternization Policy),德国称其为“亲善禁令”(Fraternisierungsverbot)。美国政府试图凭借这项措施,以“别理德国人”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惩戒全体德国人对纳粹战争暴行所负有的“集体罪责”。不过,反亲善政策实际执行中乱象丛生,禁令始终难以奏效。1945年10月1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 for Germany,简称ACC)撤销了反亲善政策。

反亲善政策的基础是“集体罪责”的观念——“所有德国人过去都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潜在的纳粹分子”,全体德国人都必须为纳粹的倒行逆施承担罪责。^①这种观点虽然是一种政治立场,但与战时西方社会对德国历史的诠释关系密切。本书意图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源于德国“集体罪责”历史观念的反亲善政策,在同盟国改造战后德国的进程中发挥了何种影响?

^① Friedrich Baerwald, “Non-Frater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Breakdown of an ‘Operational Concept’”, *Th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 No. 1 (Mar., 1946), p. 17; 另外参见:Petra Goedde, *GIs and Germans: Culture, Gender, and Foreign Relations, 1945–1949*, p. 43.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反亲善政策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受关注程度差异较大。国内学术界对反亲善政策的研究不多,主要是从专题史的角度,如民主化改造或女性史等方面,论及反亲善政策对战后德国社会的影响;国际学术界关于反亲善政策的研究较为丰富,其发展趋势是:从单一的政治史视角,转为融合社会史的多元维度;从自上而下地探讨政策得失,逐渐转向自下而上地反思社会观念与政治决策的关系。

(一) 国际研究动态

国际学术界对反亲善政策的研究相当丰富,主要分为三个类型:(1)同时代亲历者和观察者对于反亲善政策的评论与回忆;(2)对美国军政府的历史研究,论及反亲善政策;(3)从多元视角出发对反亲善政策的研究。从时间上看,三个类型的研究先后出现,分别盛行于二战后初期(德国被同盟国分区占领时期)、“冷战”时期(德国分裂以后)和后“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下文将会逐一分析和列举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最后总结其发展趋势。

(1) 同时代人对反亲善政策的评论

在今人的视野中,亲善禁令只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但是在二战结束前后,人们对打败、占领和改造纳粹德国的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代人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关心。反亲善政策堪称当时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记者、评论家和亲历者根据切身体验,率先对反亲善政策做出了立场鲜明的